



苍龙行雨海生涛,老树新花著嫩条

——“中国哲学书写范式反思暨纪念萧萓父先生冥诞 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乐恒

2014 年 11 月 8 日至 9 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国学院联合举办“中国哲学书写范式反思暨纪念萧萓父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黑龙江大学、台湾慈济大学、日本东北大学等相关高校学者近 50 人参会。本次会议有两大主题,一是缅怀萧萓父先生的学术、道德、文章;二是讨论中国哲学的书写范式和方法视野。萧萓父先生(1924—2008)是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的奠基者,在中国文史哲学界以至海外学术界均享有盛誉。在中国哲学研究上,萧先生独树一帜,论证“明清启蒙思潮”,引发广泛讨论;在教育事业上,萧先生联合李德永、唐明邦先生,辛勤数十载,建立并培育了珞珈山中国哲学团队。同时,萧先生生前不但在明清哲学研究以及明清“启蒙”学说的构建上作出卓越贡献,而且在 20 世纪中国哲学书写范式上独辟蹊径,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近代以来,中国哲学进入现代性转化的动态过程中,这一过程也带来了不同研究范式的转换。21 世纪初学界掀起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就是中国哲学书写范式转换的一种信号,因此学界有必要继续探索中国哲学书写范式的形成与塑造之路。现根据参会学者的发言与报告,将会议内容分三部分综述。

(一) 萧萓父学术思想的研究与讨论

在这次会议中,参会学者发表了不少研究萧萓父先生学术思想的论文,许多萧公的学生也对萧公作出深情缅怀。研究萧先生学术思想的论文,内容主要集中在萧先生的“早期启蒙”说。

郭齐勇的主题发言缅怀了萧公的学术事业与光辉品格。首先,他表达了对萧公的感恩之情。其次,他指出萧先生对当代中国哲学的书写方式起到奠基和导引作用。萧先生与张岱年、冯契等老一辈学者,都继承了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哲学方法,强调逻辑与历史的螺旋式统一,认真探究中国哲学范畴史的逻辑发展;另外,萧先生还主张哲学史的纯化与泛化的张力与统一。郭齐勇还强调萧先生对于上述研究方法并不墨守成规,指出老一辈学者在哲学史方法学上的逻辑建构以及他们对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强调并不会过时,当代学界应作继承与发展。最后,他探讨了自己对于萧先生“明清早期启蒙说”的独到理解,指出萧先生的“启蒙”观蕴涵着“启蒙反思”的内涵。另外,郭齐勇还强调我们对萧先生的学问人格应保持“知人论世”的省察,联系当时萧先生的生活与处境而作思考与体会。李翔海则作“从中国哲学对启蒙时代欧洲的影响看‘早期启蒙’说”的主题发言。他指出萧先生“早期启蒙”说在 21 世纪遇到局部质疑(通过民族本位立场进行质疑)甚至全然的否定(通过西方中心立场作出否定)的“困境”。而对于这个问题,学界应作两方面解读。首先,要承认“早期启蒙”之前的宋明理学的积极意义。具有无神论特征的宋明理学对于欧洲启蒙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这能够显出中国哲学自身的整体性,使得中国学界可以通过

考察这个历史过程而将关注点放在提炼中国哲学的理论特质上。其次,我们也不能否定“早期启蒙”说,这是因为:第一,这个观点能够凸显宋明理学与早期启蒙思潮的实际差异;第二,这个观点推翻了否认中国文化自身能够作出现代性转化的谬论,让人们看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生命力;第三,这个观点可视为20世纪中国哲学学科发展历程的缩影。张志强作了“梁启超、侯外庐、萧蓬父‘启蒙’说异同比较”的报告,指出梁启超的启蒙论述侧重在“政治现象”与“学术变迁”,侯外庐侧重在“社会运动”与“社会实践”,萧先生则侧重在“思想多元”、“文化主体”、“启蒙与启蒙反思”。他分析后指出,梁、侯、萧三先生的观点恰如经历“正”、“反”、“合”之途,萧先生的观点可纠正梁、侯之偏。

除了讨论萧先生“早期启蒙说”外,柴文华、高华平、郑朝波、肖航、胡治洪和何燕生等与会学者还就萧先生的船山学研究、诗性思维、学术史观、哲学史史料学等论题作出展开。

(二) 中国哲学书写范式的总体性思考

本次会议还特别就中国哲学书写范式的转换与革新,从哲学、哲学史、学术史、诠释学、经学史、少数民族哲学、中西马哲学的互动等角度和视野作出讨论,体现出中国哲学界中青年学者的最新思考与推进。

吴根友梳理和讨论了“哲学”、“哲学史”、“明清哲学”三大方面问题。在“哲学”的问题上,他指出“哲学”的根基在于形而上学,其主要方式在于通过概念化的方式把握世界。其次,在“(中国)哲学史”的问题上,他回顾和总结了各门各派的哲学史方法论,主张在回归哲学本性的基础上融会诸家,中西对比,包容开放,显豁特色,从而展望哲学史的重写工作。最后,在“明清哲学史”的问题上,他回顾了萧蓬父、侯外庐等人建立明清哲学史研究范式的意义与价值,同时思考了其中的某些困难,指出我们应该从世界历史、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审视明清哲学。李承贵考察了20世纪中国哲学界在“以西释中”主流导向之下,许多学者其实一直在进行“以中释中”或“自我诠释”、“自我认知”的工作。这些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比最近20年中国哲学界对“自我诠释”的片面崇拜要来得富有成果。林安梧阐发了他对“《论语》及其本体诠释学的思维”的思考;另外,他还指出学界应努力发掘与运用传统经典中带有生活性的话语,从而不断地让“道”、“言”、“人”进行良性多元的互动,最终促进中国哲学新的话语方式的生成。景海峰对“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做出历程性回望,指出当代中国哲学学界应作“大写的中国哲学”思考,也即中国哲学与当下中国的处境应深度关联起来,而不仅仅局限在“小写的中国哲学”即学科分工下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从事大写的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学的思考与思辨,必定离不开中、西、马三家哲学的良性互动。据此,他力主透过生活实践之场的巨大能量与作用,超化中、西、马哲学因相互隔阂而造成的对立之势,展望未来中国哲学可能的健康发展。郭晓东的主题发言是“经学与中国哲学史研究”,他思考一百多年来中国学界通过西方哲学范式处理中国思想资料所造成的负面效果,努力展示出经学与经学研究的合法性,揭示出经学研究的缺席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所造成的某些问题与困境。蒋国保对“重写学术史”的问题作出前瞻性建议。他分析了“学术”与“知识”的关系,指出学界将来重写学术史宜从“元学术史”即知识的成因、产生、积累、扩展、变革的角度阐发,这样才能将学术史与思想史区别开来。学术史研究的是思想化为知识,而各专门史包括思想史则研究知识化的思想。萧洪恩报告了“民族哲学研究与中国哲学未来之路”,指出未来中国哲学的书写理应融入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并最终形成涵盖各民族哲学的中华民族哲学史的新传统。

除上述内容外,孙邦金、邓辉、周海春等与会学者还就另外一些相关论题作出独到的探析。

(三) 中国哲学史的具体性研究

除了宏观论述外,与会学者还通过具体的哲学史研究,直接或间接地与本次会议“中国哲学书写范式”的主题形成某种关联。相关论文涵盖先秦两汉哲学、宋明理学、明清哲学、近现代哲学思想等。

首先是先秦两汉的哲学思想的探索。郑淑媛着重揭示出先秦儒家“以史养心”的历史解释模式,指出先秦儒学对于历史的事实叙述与历史的价值解释是相通一致的。王林伟通过研究孟子学中“见性”的问题,指出“见性”的重要意义,认为孟子思想中,见性的整体过程包含有显性(性由心显)、养性(尽心成性)、定性(践形生色)三个步骤。丁四新教授从文献考证、经学史等角度细致辨析了西汉时期《周易》经

学地位的抬升过程，并且逐一分析了西汉易学的三个主要问题，也即《周易》的立经、《周易》经学从“师法”到“家法”的转变以及《周易》从卜筮到经学形态的转变问题；他还辨析了西汉易学与帛书《易传》的关系，讨论了两汉易学中的仿《易》之作。

其次是宋明理学研究。林宏星分析朱子对于道德动机的观点，指出朱子将道德行动的主体归为心，此心具有认知、情感、欲求三层内容。这三个层面中，认知具有首出、导引性意义，并通于情感、欲求，因此朱子的道德认知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内在的实践性，并包含有发动道德行动的动力与欲求。故朱子关于道德动机的理论乃是一种“认知内在论”。不过，他继续考察朱子的心结构，指出在朱子理学中，道德认知其实并不一定会引发道德情感并落实为道德行动。刘乐恒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梳理程颐（伊川）理学中的性情关系问题，指出伊川理学中蕴涵着两种“对比性”。但无论哪一种对比性都不能如牟宗三先生那样证成伊川理学中性与情、理与气等两两对比之物可以截然分开。姚才刚关注刘宗周的“改过”说及其伦理义涵，认为“改过”说揭示出人们应该体知到人性本身的阴暗面，并揭示出人们应该树立终生改过的意识。问永宁具体梳理了明末学者、易学家黎遂球的易学思想与解易方法，对之作出定位与反思。

再次是明清学术研究。李大华从庄子“自然之道”、“游”等概念出发，指出船山解《庄》是要让庄子自己说话，从而使人感受到船山的解释毫无隔阂之感；另外他还指出，船山解庄并没有以儒家立场来批判庄子，或借庄子之说以发挥其儒家之论，而是本着开放、求知的精神以解庄，使得其《庄子通》一书具有更大价值。郑朝晖报告他对于清代儒者郑吉甫关于“朴学”的言说的研究，分别从“方法优先”、“义解为重”、“阅历作基”、“自得成家”四方面作出梳理。

最后是近现代哲学思想的具体研究。欧阳楨人报告了“刘咸忻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指出民国学者刘咸忻分别超越了当时西化派和守旧派的局限，融会了儒家的中庸之道以及道家的退处无为，对当时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作冷观、远观的态度，从而试图显豁出刘咸忻学术思想的独特性以及他在文化的思考观察上的睿识。储昭华着重疏解了严复由前期主张对中西文化“辨异”走向后期主张“求同”的过程，指出严复思想虽有前后期不同，但其对自由、富强的追求则贯彻其思想的始终；他并指出，我们不能夸大严复前后期思想的不同，当今时代应“求同”与“辨异”并存。徐水生对比了日本学者武内义雄的《中国思想史》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梳理出武内氏《中国思想史》的特色所在，然后辨析其与冯著的若干同异之处。田文军详细总结了张岱年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历史贡献：首先，张先生是以问题史确立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的；其次，张先生生前系统地探讨了中国哲学史学；最后，张先生以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完善中国哲学史学科体系。他还强调，经过张岱年先生的阐发和努力，中国哲学史学科乃形成一个群体或系统，而并非单一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所可以概括者。

综上，本次会议的上述三大内容，体现出中国哲学界特别是中青一代学者，对萧蓬父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尊重、缅怀、感恩之情，更体现出中国哲学界在继承老一辈学者研究成就的基础上，努力重建和培育新时代的书写范式的勇气与睿识。当然，这次会议也留下一些重要的问题有待讨论。例如，当代以至未来的中国哲学，其最重要的努力，是要建构“方法”还是要明确“问题”？新的哲学书写范式的建立，是以“中西对比”为主，还是“古今之辨”为主？这些问题，会议都缺乏明确的体知和讨论。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走过了纷纭复杂的 20 世纪，而机遇与挑战并存的 21 世纪，当代的中国哲学将继续在期盼中探索与前行。

●作者地址：刘乐恒，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Email:liuleheng@gmail.com。

●责任编辑：涂文迁